

近思录通解

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
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
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
佩先師之格言奉前列
之遺矩惟闡然而日脩
或庶幾乎斯語
紹熙元年孟春良日晝
對鏡寫真題以自警



朱高正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思录通解

倜傥乎禮法之場沉潜
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
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
佩先師之格言奉前列
之遺矩惟闡然而日脩
或庶幾乎斯語
紹熙元年孟春良日喜
對鏡寫真題以自警

朱高正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思录通解/朱高正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617-7711-4

I. ①近… II. ①朱… III. ①理学—中国—南宋②近思
录—注释 IV. ①B24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8809 号

近思录通解

著 者 朱高正
责任编辑 庞 坚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3.5
字 数 43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3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7711-4/B·562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一

陈来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列举中国人了解国学的必读书时，仅仅提出了七部书，其中便有《近思录》。这是因为钱穆所理解的“国学”主要是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而言，而《近思录》显然是钱穆推荐以代表宋明时代主流学术思想的典籍。

不管钱穆所列举的七部书是否足以代表中国学术思想，毫无疑问的是，《近思录》自从南宋淳熙二年(1175)编定以后，在理学发展史上确实已经成为宋元明清理学的经典。特别是，南宋中期以后，理学已大体分为两派，即程朱派和陆王派，而不仅元明清各代的程朱派理学推崇《近思录》，即使是陆王派思想家，也多认同“濂洛之学”作为宋以来学术思想的渊源。因此，作为理学渊源经典的《近思录》便获得了普遍的重视。

《近思录》作为北宋理学濂溪、二程、横渠四先生思想材料的选辑，其所以得到后世的普遍认可和广泛传布，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近思录》的主要编辑者是著名的理学大师朱子。朱子思想学术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在元明清历代所处的主流思想的地位，使得代表了朱子思想源头的北宋四先生的思想选辑《近思录》，也获得了其他书籍所不能获得的地位。

《近思录》是由朱子与他的友人吕祖谦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夏共同选编而成。就1175年的思想学术界来说，已形成了朱子、张栻、吕祖谦“东南三贤”主导的局面。在三贤之中，朱子最长，张栻少朱子三岁，吕祖谦少朱子七岁。三人不仅为学术的讲友，也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从1170年至1173年，朱子在乾道后期通过与湖南学派的多次辩论，提升了自己在学界的地位，整合了湖南学派与道南学派的思想，在已发未发、知觉言仁、仁说等方面确立起了以朱子为中心的新的整合。换言之，经历了乾道后

期的几次重要辩论,朱子日益显示出其深刻的哲学分析能力,在三人中已经成为思想学术的核心。在朱子与湖南学派的一系列辩论中,吕祖谦基本是附和朱子主要观点的旁观者,并没有较深地介入讨论。朱、吕的这种关系,也一直保留到《近思录》选编时。由此可知,《近思录》的选编,必然是以朱子为主的。

同时,《近思录》的完成又是在朱陆鹅湖之辩的前夕,朱子与吕祖谦选编《近思录》后,二人便携朋友、门人自闽北赴江西信州鹅湖寺,与二陆会面论学。可见,《近思录》的编定标志着朱子及吕祖谦已确立了他们学术思想的全部宗旨与细节,《近思录》为他们准备了用以面对二陆挑战的经典资源与基础。甚至可以说,在某一程度上,《近思录》的编辑正是为了与二陆论学而明确理学基础理论和基本工夫的活动。

因此,《近思录》代表了南宋理学所确认的理学体系及其基本结构。从此,理学不再是一堆不成体系的资料,而是有确定体系、层次的,包含从道体到工夫的完整体系。当然,《近思录》也代表了南宋理学对北宋理学的一次重构,代表了南宋理学自身在整合之后对北宋理学的理解和解释,更准确地说,是朱子所代表的或朱子所主导的南宋理学对北宋理学的重构。由于朱子在南宋以后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的权威地位,被视为濂洛关学的正宗继承者和发扬者,使得朱子所主导编辑的《近思录》广泛流传。

《近思录》的编辑,本是朱子与吕祖谦有感于北宋理学著作“广大闳博,若无津涯”,初学者无法把握,难以入门,所以“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是为了便于时人的理学入门书。《近思录》选编的是北宋理学的文献,但对今人来说,以此书入门并不容易。仅其中语录的部分带有当时口语的特色,对今天的青年学子,就已不易读。其不易读的原因不仅是古文与现代白话语文的差异,事实上《近思录》的古文本本身并不是很难读的,真正的困难在于《近思录》的内容是有一套特别的话语体系,有一套从儒家经典化出的概念系统,一套在佛道教刺激下产生的工夫实践的体系。因此,读懂这一套理学话语体系,仅仅具有一般的古文知识的程度,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一种帮助今人进入《近思录》思想世界的全面而透彻的解说。朱高正博士的这部《近思录讲读》,正是这样的一部著作。

朱高正博士是台湾著名政治活动家。他在政治活动上所富有的创发性的冲击力和打击力,在推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朱高正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胸怀亦不同寻常。他富有政治活动的实际经验,既审时度势,又敢作敢当;对具体政治问题的观察入木三分,对政治问题的解析条理分明。而更令人钦佩的是,作为一个出生于台湾南部的本省人,他的政治视野从来没有仅仅限于台湾岛内,他从来都是把台湾的民主化和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放在一起考虑。这使得他的政治心胸,纵深开

阖，格局广大，善于从战略的角度看问题。在今天台湾的政学两界，这样的杰出人士，是不多见的。

朱高正不仅是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的著作有《朱高正讲康德》、《周易六十四卦通解》、《易经白话例解》、《狱中自白：论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等。他在康德法哲学研究方面造诣甚深，在有关政治、法律、文化方面的学理分析，明辨清晰，能力过人。可贵的是，在台湾的民主化、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两者之外，朱高正还提出“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此一主张亦可称之为当代中华文化的主体化。在这一点上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长久以来，他用功于中国典籍的研读，他在《易经白话例解》中的慧解，颇得朱伯昆先生的充分肯定，这是朱伯昆先生当面对我说过的。而我更重视的，是他对于中华文化的态度。从他对《易经》的解释，和他对《近思录》的解说可以看出，他不是把这些典籍当作知识的对象，而是把中华文化的典籍当作圣贤智慧的宝库，用心加以体贴，并且力求应用于生活实践。他对中华文化的经典满怀“敬意”，此种态度最近古人，故他对经典的细心体贴，也颇能得古人之意。

高正认为，《近思录》一书既概括了理学的纲领，也是朱子学的基底，这种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他对此书的研读，已经反复十来次，从其书前导读可见，他对此书，可以说做到了朱子《书近思录后》所说的“沉潜反复，优柔厌飫”。他的解读，都包含了他对《近思录》一书阅读践履的身心体验。这种以“身心受用”为宗旨的读书法，在今日的两岸三地知识分子当中，已经是很少见的了，这是我特别要提出加以表彰而请大家切勿忽略的。

由于高正著作此书的目的是“让现代人可以花最少时间，减少不必要的困难，汲取先圣先贤的智慧，并接受他们高贵品德的熏陶”，所以他著此书的方法是，“坚决避免掉进繁琐的训诂与考据”，“不以注或译为主，而以解或通为要”，“希望能以最浅白易懂的文字，即使不对照原文，也能让读者掌握《近思录》的精髓，进而对自己的立身处世有所裨益”。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还特意将原书首卷《道体》卷移到末卷。我要指出，这种做法决不是随意而为，因为在朱子和吕祖谦编书之时，就曾对此卷的安排多次讨论，而高正此举，更突出了他把儒学或理学作为“身心之学”的关怀。

我与高正兄结交十余年，今年夏天，他的书稿写成后，送我一读。我读了此书书稿，觉得注释简要，讲读清楚，文语明白，精而不烦，深入浅出，是我目前所看到过的今人对《近思录》的最好的通解，很值得向读者推荐，故乐为之序。我还要说的是，《近思录》所载的是理学奠基和建立时期的四先生思想资料，其中并没有理学集大成人物朱子的思想资料。钱穆先生推荐的国学书目，《近思录》下面就接着王阳明的《传习录》，跳过了朱子，这是我不以为然的。所以，在此篇小序的结尾，我想表达进一步的期望，

期望高正兄作为朱子后人,在将来有时间与机会的时候,对朱子本人的著作言论选编,也作一番通解,使朱子之学的深意,大明于天下,是所望焉。

2009年11月29日于清华大学立斋

序二

张善文

(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古典文献博士点带头人)

今年暮春，与朱高正兄相会在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有幸聆听他关于朱子理学的演说。临别前夕，山间雾霭沾衣，筠风拂面，他取出所著《近思录通解》一套三册相馈。谓此书新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日将交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简体字本，并嘱我制序一首，拟弁书端。

闻嘱十分欣喜。我与高正兄交往十有七载，对他的国学造诣和理学功夫，均极企佩，能为他的大著撰序，藉以述学志道，乐曷如之？其喜一也。我历来颇爱读《近思录》，基于长期对北宋四子道德文章的高度崇拜，而今能为挚友通解这部伟著的作品写序，岂不荣幸？其喜二也。有此二喜，谊未容辞，敢不肃然应命而兢谨为之欤！

八百年前，南宋朱熹、吕祖谦两位大儒联手合编的《近思录》，采辑了北宋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著作的核心内容凡六百二十二条，按类分为十四卷。题作“近思”者，取自《论语·子张》中的一段话：“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所谓近思，何晏《集解》说得好：“近思己所能及之事。”顾名思义，此书的编辑目的，是让学者通过研读周张二程学说的最精要处，结合自身所涉及的种种事务而贴近思考，以悟圣人之大道，以明理学之宏旨。所以，朱熹的《书近思录后》曾作出这样的告白：“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这是何等伟大的思想啊！面向社会群体，面向年轻一代，面向天下后世，传布中华数千年承传不息的优秀道德文化，朱子敞开了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于是乎，历宋元明清四朝，中国读书人的案头必备典籍便有了一部光彩溢目的《近思录》。这也是我以及与我有着同样思考的当代人，依然热衷于研读《近思录》之所以然。

对于那些寻章摘句而浮泛无根的冒牌哲学,我无暇哓哓置喙,尽管当世追时髦以名家者不乏其人也。我以为,展读《近思录》,最需研寻的问题莫过于追思道统、反求诸己。儒家思想是华夏民族的灵魂,世道人心是国富民强的根本。让我嘉叹不已的是,高正兄的《近思录通解》抓住了这一关键要素,切切实实地联系当今世界的现状,通说道统、解析理道,为读者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步入《近思录》思想殿堂的优秀著述。

大凡通俗易懂的学术著作,最难撰述,非高手、高水平的学者莫能为也。纵览高正兄的《近思录通解》,可以看出作者无不在深入浅出处入手。约其要者,似可从四方面呈验作者的独到创获:去障碍、明阶梯、揭大旨、示读法。谨为分述如次。

一曰,去障碍。

要屏去今人阅读古籍的障碍,谈何容易?高正兄煞费苦心地挖掘出现代人难读《近思录》的四条原因:一是《近思录》内容的义理与文字本就较为生涩,现代人的理解能力往往不足;二是《近思录》乃朱子整理出来的儒学纲领,现代人苦于对儒家经典不熟;三是《近思录》引述儒家经典五百多处,其中引《易》二百余处,现代读者多难跨越这样高的学术门坎;四是《近思录》开篇首卷即言天道人性,立本于《易》之太极学说,最为艰深,常令现代人一开卷就知难而退(详《近思录通解·导读》)。找出形成障碍的原因,或许已经向逾越障碍跨出了一大步。高正兄的《通解》为此作了重大努力,如每卷之解题、各条之注释、随文之串讲,均注意联系实际,疏通疑难,分解义理,以启迪读者在较为轻松的语境中逐渐领悟,然后寻求进一步的思索发挥。他甚至大胆地为初学者着想,把最难懂的卷一移置书末,让读者从卷二开始,由浅入深地循序研读。这种改变卷次之举,实亦不悖原创者的内在理念。朱熹后来就对学生说过:“看《近思录》若于第一卷未晓得,且从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后看第一卷则渐晓得。”(《朱子语类》卷一百五)

二曰,明阶梯。

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所在。儒家文化的根本,则是《六经》。西汉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都是关系到此后二千多年华夏学术文化命脉的大事。东汉以来,虽有佛道二教相继兴起,对中国文化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渗透与冲击作用,但时至今日,儒家学说作为中华文明古国之正统、核心文化的地位终未被真正撼动过。其原因安在?历来学界的阐说固是纷纭缭转,但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新儒学对儒家“道统”坚确不移的捍卫和拓展之功,实属关键的一节。宋儒理学,所为何事?程子推举《四书》,以承《六经》;朱子编定《近思录》,用绍《四书》。于是乎,文化之脉绪如缕不绝,学者之道统昌熙大明。换言之,宋儒的学术伟业,正在于为千秋万世奉献了迈向儒家《六经》的两道阶梯。阶梯一至,斯道永昌。高正兄通解《近

思录》，也紧紧扣住“阶梯”环节，向现代读者宣示了《近思录》、《四书》、《六经》之间密不可分之纽带系结。我十分赞成他由此得出的推论：《近思录》与《四书》、《六经》并列为儒家经典，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详《近思录通解·导读》）。其实，朱子也曾这样谆谆教导过他的学生：“《近思录》好看。《四子》（指《四书》），《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百五）

三曰，揭大旨。

研讨古籍，须知大旨。面对儒家经典，尤当如此。有人要问，《近思录》的大旨是甚么？从“求端用力、处己治人”的角度言之，不外乎三端：笃行道德，明辨义利，谨持尊严。高正兄的《近思录通解》，似乎始终贯穿着对这一大旨的揭示与弘扬。而且，他更一路考察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以及当前全球化浪潮对华夏儒家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等历史足迹，明确指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肯定可以和其他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一样，为纷扰的、日渐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选择与启发，而朱子学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详《近思录通解·导读》）我清晰地感受到他的言外之意：《近思录》的优秀思想没有过时，正像代表儒家文化之灵魂的《四书》、《六经》一样，其精粹的道德理念将继续引领今天的人类以健康的步伐迈向明天。这是儒家经典的品格，是民族文化的尊严，也是《近思录》大旨的绚丽光彩。

四曰，示读法。

读书不明其法，必将事倍功半。奉读《近思录》这部“性理诸书之祖”（《四库提要》语），更应当讲求读书方法。高正兄的《近思录通解》，犹如一位明师，在循循善诱诸生，处处示以读法，时时告以条序。前文述及他特意将卷一移置卷末，欲使读者先易而后难，即见此心之端倪。他在《导读》中还专门强调：“本书不以注或译为主，而以解和通为要。”其意在于，让读者借助最浅白易懂的文字，先行理解和洽通，进而对自己的进德修业、立身处世有所裨益，最后终能得鱼忘筌，提高直接阅读原文的能力。居心之细密，可谓溢于言表。更有甚者，他又从《近思录》六百二十二条原文中，选出最具代表意义的五条，建议读者优先阅读，分别是：卷二第三条《颜子所好何学论》、卷六第十七条《程子父母行状》、卷十四第十七条《明道先生行状》、卷二第八十九条《西铭》、卷一第一条《太极图说》。我相信，初次接触《近思录》且期盼学有所得的读者，倘依如上读法以修之，将无虞不得其门而入也。高正兄的境界显然更加崇伟，他希望通过研习《近思录》，“读者诸君对传统优秀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体认，对自己的安身立命也会有焕然一新的自信与自许！”（详《近思录通解·导读》）

综上述四事，是我拜读高正兄《近思录通解》一书的肤浅体会，唯所思未广，所视欠弘，恐是管中窥豹，尚未能见其一斑也。纵然如此，我仍想趁着这一重大命题，借机衍

叙两点未尽之意，以请教于高正兄及有缘阅览此书的读者。

其一，欲深研《近思录》，当选读前贤古注。《近思录》问世迄今，历代学人所作的批注阐释之书不胜枚举。就目前流行的今人关于《近思录》的入门读物观之，高正兄的这部《近思录通解》，无疑是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然对于企望深度领会《近思录》的读者来说，仅局限于阅读今人解说却是不够的。不读古注者，将无以与古人的各种理解尽量沟通，以图切用于今世。那么，在众多的《近思录》古注中，最需阅读的是哪些呢？这里姑举五种以备参考：（一）〔宋〕叶采《近思录集解》，有《四库全书》本、《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宋刻明修本；（二）〔清〕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有《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三）〔清〕江永《近思录集注》，有《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四）〔清〕张伯行《近思录集解》，有民国五年福建经学会铅印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五）〔清〕陈沆《近思录补注》，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湖北省图书馆藏稿本。这五种古注，各具特色，均颇重要，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取资省览。

其二，欲彻悟《近思录》，当兼读宋儒原著。《近思录》的内容，本为北宋四子周张二程著述的精华，当年编者的目的，是欲令学者先读这些精华，渐入理学之门，然后再全面研讨四子的原著，进而彻底掌握理学的精深蕴蓄。朱熹在《书近思录后》中，特地对此作了交代：“如此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沈潜反复，优柔厌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所以纂集此书之意也。”因此，有远大志向的学者，不应畏惧烦劳、贪图简便，只满足于阅读《近思录》一书，而是要博览四君子的所有著作，以求由博返约，尽得其精蕴。甚至努力结合朱熹的种种著述，详探朱子思想对四君子的继承与发展，如此则濂洛关闽的承传渊源将了然于胸间，两宋理学的精神晖光将映照于今日。倘能获此伟效，岂不美哉！

另需提及的是，《近思录》之于学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功用，即“变化气质”。这是历代圣贤均时时奉行的不断自我优化的伟大理念。我敬佩高正兄的原因，固在他所撰《近思录通解》极为关注这一理念，更在他身体力行地在实践着这样的理念。我深知他学贯中西，二十余年来在台湾政坛、学界都颇有显绩。但他却往往不以既得的成绩为然，总以变化自我的气质为念。他自述先前无法读通《近思录》，尤其是第一篇《太极图说》，后来因练习太极拳，终于悟得《太极图说》之理，并对整部《近思录》沉潜反复，乃至一发不可收拾，遂有《近思录通解》之成（详《近思录通解·导读》）。其实，据我多年与高正兄相过从的具体感受，发现这段时期之后，他不仅练了太极拳、完成了《近思录通解》，而且在立身处世、精神气质方面有了异乎寻常的升华：无论待人接物，还是言行举止，总是多了一种雍和平实、睿智从容的气度，这在往昔似乎是不甚凸显的。果若如

斯，其得益于太极拳？得益于《近思录》？抑或兼而有之，而不知不觉地践行着“变化气质”之旨？我颇相信后一种答案。俟有便时，宜向高正兄当面乞教，以叩询他肯否赞成我的愚见？

曾几何时，我临案静读《近思录》，至卷二“伊川先生答朱长文书”条，有这样几句迎面而来：“圣人之言，不得已也。……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实，反害于道必矣。”读毕惊骇不已，如梦初醒。回顾三十年来，也曾以一二部“著述”洋洋自得，但却从来未反省过这些文章是否无用之物？清代学者魏源读至此条，曾惶惶然批曰：“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令人汗下。”（湖北省图书馆藏清陈沆《近思录补注》稿本，《续修四库全书》第九三四册影印本）像魏源之学富五车，尚且掩卷愧汗，又何况其余呢？

怀着对《近思录》的崇仰之情，以及对高正兄的钦敬之意，勉力写了以上文字。倘有一二可取之语，私心慰甚。第恐其间难免孱陋诸多“无用之赘言”，则除当自深检讨外，诚祈知我者忽而置之可矣。

公元二零一零年岁在庚寅初夏之日
写于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

导 读

《近思录》这部书笔者平生第一次接触是在1972年高三时期，那时只知道这是非常重要、值得细读的一部古籍，奈何当时王阳明所著的《传习录》已经研读三四次了，而朱熹所主编的《近思录》却没能读下去。第二次想读《近思录》是在1975年大三时期，但还是碍于学力有限，没能读下去。第三次则是在1993年10月29日（碰巧是阴历9月15日，为朱子生日）回祖籍福建漳州寻根祭祖，核对家谱，得知自己是《近思录》的主要编辑者朱子的第二十六代裔孙后，再度鼓起勇气研读，但仍然无疾而终。最近几年因习练太极拳，得知理学对太极拳的创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乃下定决心研读《近思录》。孰知不读则已，一读下去则一发不可收，竟然反复将《近思录》研读了十来次。觉得《近思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自修身养性、待人接物，以至治国、平天下，全方位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指导。

现代人阅读《近思录》的障碍

令人纳闷的是，《近思录》对现代人怎会这么难读，我细思其中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近思录》作为我国史上第一部哲学选辑，是由南宋的两位大儒——朱熹（1130—1200）与吕祖谦（1137—1181）——所共同编纂。它收录了北宋四子——周敦颐（濂溪，1017—1073），程颢（明道，1032—1085），程颐（伊川，1033—1107）与张载（横渠，1020—1077）——代表性的著作、言论与事迹。而其中濂溪与横渠的义理与文字本就较为生涩。朱熹就认为濂溪的儒学精醇，其原创性超过汉之董仲舒、唐之韩愈，直承孔孟，而其《太极图说》与《通书》更是直承伏羲、文王、孔子，其义理多发前人所未发；而

伊川也认为横渠的文字，“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厚之气”（《近思录》卷三第三条），不甚好读。

二、《近思录》乃是朱熹所整理出来的儒学纲领，其所依据的则是北宋四子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与《六经》融会贯通后的成果。譬如伊川在解释“中和”时，就引《易传》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与《中庸》相发明（《近思录》卷一第三条）。又明道在解“终日乾乾”时则多次引用《易传》、《诗经》、《中庸》、《孟子》，以与《周易》经文相发明（《近思录》卷三第十九条）。因此，如果对这些儒家经典不是相当熟悉的话，读起来自然就会觉得很累。

三、《近思录》一书引述过的儒家经典不下五百五十处，而其中《周易》经、传即高达二百零四处，其次是《论语》一百二十一处，再其次为《孟子》八十二处，其余少则《春秋》的十三处，多则《礼》的三十五处。易言之，引述《易》的频率最高，占37%以上，超过《论》、《孟》的总和。而所最常引用的书则推《周易程氏传》（即通称的《伊川易传》）。几乎随意翻阅《近思录》，都能看到引述《周易》经、传的文字。这个现象也为现代人要读懂《近思录》设置了更高的门槛。

四、《近思录》卷一为《道体》，讲的是形而上的天道、人性的本原，吕祖谦本人在《题近思录》中说：“《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生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换言之，《道体》之所以列为卷首，其本意只是要使始学的后生晚进们“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但现代人一翻开《近思录》卷一第一条，看到“濂溪先生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大多数人就打退堂鼓了。这就像初学《周易》的人，对《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四个字在《文言传》中的各种解释还没来得及读完，早就已知难而退，如出一辙。

《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清末民初，由于西风东渐、教育体制改革与白话文的推广等原因，造成了现代人对自家传统文化的疏离与断裂，因此要阅读古籍本就有一定的难度。而《近思录》作为儒学的纲领、朱子学的基础与出发点，要读懂它就更难了，更何况这部典籍是北宋四子将《四书》、《六经》融会贯通后，穿插在一起来讲论的，其阅读难度就不言而喻了。虽然困难重重，但它仍然值得一读，因为，《近思录》毕竟是儒家文化高度成熟的产物。

春秋晚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他将二帝三王（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传的王道圣学，继述阐明，而成为

《六经》，从游弟子逾三千，被尊为万世师表。1680年后的南宋初期，朱熹以二程四传弟子，将《论》、《孟》、《学》、《庸》合编为《四子》（指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并以《四子》为《六经》之阶梯；再与吕祖谦合编北宋四子之言论选辑为《近思录》，而以《近思录》为《四子》之阶梯。并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颜、曾、思、孟、周、二程、张一脉相传之圣学名之为“道统”，其有功于圣学也大矣，无怪乎成为孔子以后第一人。难怪三百年前，清人张伯行在《近思录集解序》中说：“集群圣之成者，孔子也。删定往训，垂为《六经》，而道统治法备焉。集诸儒之成者，朱子也。采摭遗书，作《近思录》，而性功王事该焉。”朱子与孔子同为庚戌年出生，属狗，相差二十八个甲子。其实，不说最近八百年，孔子以后二千五百年，将读书提高到格物穷理的哲学高度的，非朱子莫属。光最近一百年来，编纂、出版有关朱子读书法的书籍早就超过一百种，而其底本则源自《近思录》的《为学大要》与《格物穷理》两卷。虽说近人曾国藩、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有类似书籍出版，但无论质与量都远远无法与朱子相比。他一生著述等身，但影响最广泛而深远的首推这三部：《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与《近思录》。

朱子将《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中庸》与第四十二篇《大学》抽出，重新为之章句，使各成一书，并为《大学》补《格物致知传》。因《大学》相传为曾子所作，《中庸》则为曾子弟子、孔子之孙子思所作，而孟子的老师则为子思的门人。《学》、《庸》刚好可以将孔、孟之间的传承补齐，因此朱子将《论》、《孟》、《学》、《庸》合编为《四子》，或称《四书》，又为之集注，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该书是朱子用力最深、费时最久，即使在易簣之际，仍然念念不忘的一部著作，自元仁宗以来就成为科举取士的官方定本。影响所及，东亚的主要国家，如朝鲜、越南、日本，无不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为必读典籍。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自孔子赞《周易》，作《十翼》以来，历代注家何止千百？但朱子身为综罗百代集理学之大成者，其所著之《周易本义》，注解经文，言简意赅，文字洗炼。有不通难解处，宁可存疑，也绝不穿凿附会。此种解《易》学风，在易学史上是少见的（朱伯昆语）。借着《四书集注》在儒林中的声望，七八百年来，要研读《周易》的人，除了《伊川易传》以外，大多也得从《周易本义》下手。清朝康熙皇帝特命大学士李光地编纂《周易折中》，打破过去先程传后朱义的惯例，“列朱义于前者，《易》之本义，朱子独得也。程传次之者，《易》之义理，程子为详也。”自此，《周易本义》在历代《易传》中，遂定于一尊。

至于《近思录》一书，则是由当时理学的领军人物吕祖谦与后来成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所合编。朱熹承担主要的选编工作，但吕祖谦也提了不少意见。易言之，《近思录》是由南宋理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感于北宋四子的著作“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

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见朱熹《书近思录后》）。其实，《近思录》不仅概括了儒学的纲领，也是朱子学的基底。伊川先生曾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近思录》卷三第三十九条）。而朱熹也说：“《四子》（指《四书》），《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〇五）由此可知，《近思录》在朱熹的心目中无异是儒学的纲领，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近思录》与《四书》、《六经》并列为儒家经典

众所周知，由于孔子不喜谈论性、命与天道，这就使得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土之后，经过三四百年的努力，填补了这个空隙而得以迅速发展。而汉唐儒学当以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为代表，其解释儒家经典支离而烦琐。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面对以老庄为主的玄学，儒学早已显得苍白无力。而佛教到唐朝则已彻底完成本土化，《六祖法宝坛经》的出现，意味着禅学就是中国化了的佛教，不但征服了士大夫阶层，也早在民间广建佛寺，与道教宫观分庭抗礼。一般庶民不信道，则信佛，儒学早已濒临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北宋四子就是在儒学危急存亡之秋，将《易传》与《小戴礼记》中的两篇先儒旧作《大学》与《中庸》，拿来弥补孔子不谈性、命与天道的缺憾。以《论》、《孟》、《学》、《庸》为基础，结合《六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再以《周礼》取代被毁于秦火的《乐》），尤其突出《易传》与《中庸》的重要性，来重新阐释儒学。濂溪先生首开风气之先，藉由《通书》，即《易通》，在解释《易传》时，引用《中庸》、《论语》、《尚书》的辞句，这既不同于汉唐《易》学，也不同于道家或道教《易》学，而开创出以儒学解《易》的特色。二程兄弟自志学之年即奉父命受学于濂溪先生，“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近思录》卷十四第十七条）。横渠先生则又受二程之启发，而尽弃异学，返求《六经》。因此后人就将濂溪、二程与张子所开出的新儒学称为“道学”或“理学”。而朱子也就独具只眼，推尊濂溪先生为理学的开山祖师。

南宋淳熙二年（1175）初夏，四十六岁的朱熹，身为二程的四传弟子，借着好友吕祖谦由浙入闽来访之际，一起在武夷山的寒泉精舍，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重读北宋四子的著作。并依照道体、为学大要、格物穷理、存养、改过迁善克己复礼、齐家之道、出处进退辞受之义、治国平天下之道、制度、君子处事之方、教学之道、改过及人心疵病、异端之学、圣贤气象等十四卷的次序，将北宋四子“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言论与事迹分门别类编为《近思录》一书，共六百二十二条，以便“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

友以先后之者”，可“以得其门而入矣。如此，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沈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朱熹《书近思录后》）。由此可见，《近思录》是朱熹依其对孔孟圣贤之道的理解，将“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精心拣择的一部儒学纲领与入门书。这就难怪早在南宋时期，《近思录》杰出注释家、也是朱子的再传弟子叶采，就说本书“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该，本末殚举”。而清代著名学者、向以提倡“以朱解朱”闻名的江永（1681—1762）在其《近思录集注序》中，更说：“盖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可见江永已将《近思录》提高到与《四书》同样高的经典地位。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直称《近思录》为“性理诸书之祖”。因此，《近思录》这十四卷的次序也规范了以后“性理诸书”的次序，如明代的《性理大全》、清代的《性理精义》。

《近思录》在朱熹一生所编撰著作中，其用力不如《大学》深，费时不如《四书集注》长，却是传刻最多、流布最广的一部。从《近思录》问世以来，到清末民初，七百多年，各种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补编本、心得本，现存仍多达一百四十余种，这还不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主要国家的许多传本在内，这种“《近思录》现象”连《四书集注》也难望其项背（见程水龙《〈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页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其实，南宋以降，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于《近思录》的注释、刊刻、流布而得到广泛传播的。由于《近思录》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哲学选辑，是以北宋四子的著作为蓝本，而且他们都是结合《四书》与《六经》一起来讲论，因此没有良好的经典底子，尤其是对初学者，读起来十分辛苦。所以《近思录》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以白文本的形式来传播，而是伴随着大量的注释、集解与集注，这也就更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传播。因而《近思录》的地位也更加突出，与《四书》、《六经》并列为儒家经典，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程思想无从分割，也不必强为分割

《近思录》一书所收录的六百二十二条中，濂溪先生十一条（1.77%）、横渠先生一百十条（17.68%），其余来自明道、伊川两先生。易言之，二程兄弟占了80%以上。至于哪些是明道语、哪些是伊川语，有不少地方颇难分辨。陈荣捷就曾举《近思录》卷二第三十条“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为例，朱子多次引用此条，但或以属伊川，或以属明道，或只言“程子”，其曰“程子”往往是二程并指。陈荣捷并指出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将此语断为伊川语，可谓多此一举（见陈荣捷著《近思录详注集评》，卷二第三十条注①，页60，卷一第十九条注⑩，页1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